

游击伏兵隐锋芒 奇袭据点奏凯歌

——探访塔岭伏击战遗迹，听村民讲当年战斗故事

□翁盈昌 吴以龙

岁月如歌，往事如烟，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，塔岭下曾打过两次伏击战，其中发生于1948年1月，击毙国民党地方顽匪王雪瑜的战斗，可称得上舟山游击史上的经典之战。

为了缅怀先辈光辉的战斗历史，追寻历史的红色印记，体验当年革命先辈不怕牺牲奋勇杀敌的战斗场景，我们重游塔岭下这块红色土地。



战斗丰碑金色的大字熠熠生辉

我们在塔岭下秀竹庵公交站下车，往北行走大约150米，就来到了一块以白色大理石为材质的舟山市革命遗址纪念碑“塔岭战斗遗址”前，石碑在春日阳光的照耀下，金色的大字熠熠生辉。在纪念碑左边，鼎梁尖山峰南，隔着一个小山包，有一个山吞花岭湾。整个山吞成口袋形，坐西朝东，绕着山吞过去塔岭公路有一个弯道，出了

这个弯道就是直路平路，塔岭伏击战就发生在这个小山吞里。

1947年下半年开始，解放战争进入了新的阶段。为了填补舟山人民武装的空白（为了保存抗日力量，1943年10月舟山抗日武装大都撤往四明山新四军根据地），此时需要在国民党的后院建立一支队伍，以策应舟山的最后解放。中共华中海

上工委决定，将镇海改编的抗日反蒋的徐小玉部队，编入浙东第四自卫纵队，并由徐小玉担任纵队长。后来纵队更名为舟山群岛游击支队（简称“舟支”）。1948年后这支队伍又与多支反蒋武装合并，更名为东海游击总队，以游击战的形式打击敌人。随后于1948年1月6日，在金塘洋面击毙国民党东区自卫队大队长顾任

父；1月10日，塔岭伏击战击毙定海保警三中队队长王雪瑜；6月6日，在龙堂岭击毙定海刑侦队长贺志根等系列战斗（上述匪顽号称东海三只狼），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在舟山的反动武装。为彰显塔岭战斗的胜利，2013年中共舟山市普陀区委以党史工作委员会名义为此立碑，以志纪念。

花岭湾：国民党顽匪的葬身之地

1947年5月“舟支”所部梁阿岳分队，在沈家门马峙门港，遭国民党定海东区自卫队围杀，43人无一生存。痛失手臂，让“舟支”忍无可忍，义愤填膺。1948年1月9日，“舟支”在塘头冷水坑宿营时获得情报，得知王雪瑜要到刚建立不久的螺门警察队巡查，布置剿灭游击队任务。获此消息，游击队员们兴奋不已。毒蛇终于出洞了，要为死去的战友们报仇雪恨。担任这次伏击战的指挥员就是舟山群岛游击支队的支队长徐小玉。

顽匪王雪瑜，定海县保警三中队中队长，兼沈家门军警联防主任，是定海反动武装中的一支主力，全副美式装备，盘踞在沈家门。

俗话说，大有大的打法，小有小的技巧。渔民出身的指挥员徐小玉，生在展茅，长在塘头，抗战时期和1946、1947年期间，在这一带开展过长期的游击活动，对这里的情况非

常熟悉，认为塔岭有绝好的地理优势，是打伏击战的好地方。

选择塔岭下花岭湾打伏击有三大好处，一来花岭湾是从塔岭下三个“之”字形弯道的最后一个弯道，呈口袋形，隐蔽性好。二是撤离方便，翻过花岭湾岗隔壁就是赵家山村。三来塔岭距离沈家门10公里，距离螺门5公里，距离定海更远，战斗打响后敌人接应困难。所谓人和优势，这里的敌伪组织相对薄弱，并且有较好的群众基础，老百姓痛恨国民党的反动统治，倾向游击队。塔岭下是一块红色的土地，抗日战争时期一带是定海东区警察大队（共产党领导）积极开展抗日活动的地方，这里还出过革命烈士吴由台和吴瑞成；把四个子女送往抗日根据地的模范抗日母亲吴杏娥；1940年东区警察大队还曾在这里打过一次伏击战，有成功歼灭汉奸林财先例。

1月9日晚上，王雪瑜等人到达螺门后便

召集当地的保警队和乡保长开会，布置工作后，准备连夜赶回沈家门去。王的部下姓邓的中队副说“中队长晚上还是不要走为妙，好歹明天白天再走”。这天晚上王雪瑜便这样留下来了。

第二天，天还没亮，“舟支”三十余名战士在徐小玉、江之铭、何育芳的率领下，静悄悄地埋伏在塔岭花岭湾山脚两侧树丛中。江之铭、何育芳等10余人守北侧；徐小玉带警卫班配一挺机枪守西侧；梅耐青、芦瑞元等守正面。

何育芳进入阵地后，在路中间挖了个洞，洞里伏着3名战士，准备在敌人到来时，跃出洞口，用冲锋枪和手榴弹正面进攻，其他的战士伏在树丛里和石头背后。并派出一个岗哨，以落伞为号。等了一个上午，时近中午11时半，看到敌人翻过了山岭而来。等待已久的游击队，听到指挥员一声令下，几十

支机枪步枪一齐开火，愤怒的子弹射向敌人，打得敌人鬼哭狼嚎。王雪瑜看着匪徒们纷纷倒地，一个一个被打死，最后只剩下自己，知道大势已去，便举枪喊着投降，还没有等他叫第二声，就被战士们的复仇子弹毙。等定海螺门军警赶来，游击队已高歌离去，消失在莽莽的山林之中。

这次战斗极大地震慑了舟山国民党的反动统治，为舟山革命史册增加了浓墨重彩的一笔，是东海游击总队的一篇经典之作。

我游击队有四名战士负伤，其中一名腹部中弹不治身亡。这位牺牲的战士年仅26岁，名叫张友全（1922—1948），展茅张家村人，自幼父母双亡，与兄弟相依为命，成年后以做木匠为生。1946年底，为抗拒国民党抓壮丁，参加了徐小玉领导的锄奸大队。1947年6月，参加浙东第四自卫纵队，他参加了一系列的战斗，表现勇敢。

听村民讲述塔岭伏击战故事

塔岭伏击战，是一场能载入舟山史册的真实战斗故事，后被写入小说《东海游击总队》一书。作者王博平是东海游击总队政治部主任。对于战斗信息，大部分是从这本书中获得，我们这些老年人，在青少年时几乎都读过，和许多革命题材小说一样，影响过我们这一代人。

战斗的硝烟早已散去，但是这场发生在家门口的战斗，在百姓脑海如同昨天，还是那样新鲜，那样震撼。如今人们讲起来还是眉飞色舞，手舞足蹈。那天我们走访三个人，他们之中两个是亲眼目睹的，一个听他奶奶讲的。个中的细节，没有虚构，没有旁白，完全是最为真实的一面，以及我过去听到过的，这些战斗故事实在难得，值得与大家分享。

故事讲述人吴由华，曾担任过塔岭下大队第一生产队队长。“当年我18岁，家无田地，家里经济靠给人家做雇工维持，生活非常困难。这天我挑担去大展卖柴，近中午时回家，上塔岭时刚好与保警中队的人同行，一过山岗他们就骑自行车飞快地下山，我

走小山下岭，才过塔岭墩庙一点点，就听到下面的一声枪响，我就慌忙躲到路边的茅草丛看究竟，因为从上看到下，看得很清楚。一听到枪响，只见六个人迅速弃车，一齐跳入路边，以地坎作为掩体开枪还击，接着看到三间头方向（笔者注：花岭湾对面），距离60—70米远的一个坟头上，埋伏的游击队机枪响了，正好打到他们的背面，东西两面夹击，王雪瑜和卫兵纷纷中弹，那天游击队足有三四十人，分东西两边埋伏，还发起过冲锋。将近傍晚赶来很多国民党海军警察等，有近百人，游击队早已离开。”

故事讲述人吴昌年，一子一女，都在城里工作，他一个人休闲在家，很是健谈。“那年我7岁，早已是记事年龄。这天屋旁地边走过三个带着枪的陌生人，个子很高，出于好奇心，我不知天高地厚地跟了出去，他们见到我后就叫我回家，不要出来，我就躲到草蓬后面去了。”“我们村的吴松盛，他家在花岭湾有一块地，早上去地里干农活，还没有走到地旁，就被游击队劝回。”“战斗结束后我们小孩子还到田边路上拾子弹壳、手

榴弹柄……”

讲述人吴以善，塔岭下老年协会会长，从普陀动物防疫所退休。“我奶奶，名字张满姐，当年五十多岁。这天大清早，和往常一样早早起来，烧火做饭。人刚走到园子，突然就看到对面山上有走动的人影。这么早到自家的柴山上干什么？她怀疑有人在偷柴，就到山上看究竟，还没有走近柴山，有个游击队领导模样的人快速地走了过来，叫她不要过来，‘阿婆这里有危险，我们在这里要坏人’，并对她讲‘回去后千万不要向别人讲’。奶奶虽然年纪已大，平时游击队经常在我们村进出，好人坏人分得清，知道其中的利害关系，回来后的几个小时始终憋在心里，守口如瓶，只字未吐，战斗结束后总算舒了一口气。以上是我多次听到奶奶讲的。”“我父亲当年28岁，他曾讲当时三间头前的一座坟头上架有一支机枪，与花岭湾形成夹角之势，战斗打响后，这挺机枪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，使敌人两面受到攻击无法藏身”。

还听到其他老人说起“战斗结束后游击

队翻过花岭湾撤退，经过隔壁的赵家山村，其中有一名中弹负伤的游击队战士，说是在收缴战利品时被还没有死的敌人打中腹部，找不出过去曾经熟悉样子。塔岭经过多次降坡，道路平且直，路的两旁还种了景观树，已成为高等级公路。昔日的大家想象中的花岭湾“口袋”，不再荒无人烟，蛇虫出没。现在许多村民在这里建起了别墅，房屋排列整齐，错落有致，成为村民们宜居的自然村落。

七十载的风雨兼程，塔岭下也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当我们站在高处瞭望塔岭下村，映入眼帘的是，是已容颜大变的塔岭，找不出过去曾经熟悉样子。塔岭经过多次降坡，道路平且直，路的两旁还种了景观树，已成为高等级公路。昔日的大家想象中的花岭湾“口袋”，不再荒无人烟，蛇虫出没。现在许多村民在这里建起了别墅，房屋排列整齐，错落有致，成为村民们宜居的自然村落。

我们驻足纪念碑前，这是一块凝聚了革命先辈鲜血甚至生命的纪念碑，这是一块永不褪色的丰碑，在社会主义新时期的今天，她永远是一块激励家乡人民，沿着先辈开辟的革命道路奋勇前进的丰碑。向先辈致敬！



如今的塔岭 本版图片由作者提供